

转型期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忻平

城视时代

——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



曾军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转型期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忻 平

城 视 时 代

——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

曾 军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 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视时代：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
曾军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 12
(转型期社会文化生活丛书/忻平主编)
ISBN 978-7-5671-2055-6

I. ①城… II. ①曾…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 ②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I206.7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4891 号

责任编辑 焦贵萍 杨颖昇

装帧设计 张天志

技术编辑 章 斐

城 视 时 代

——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

曾 军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2.5 字数 203 千字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2055-6/I·342 定价：48.00 元

总 序

在上海大学“211 工程”第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研究中,我们推出了一套“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如今“211 工程”第三期项目已经结项,研究团队对于“转型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课题继续开展深入的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其研究成果的视角与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故在原来“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的基础上,我们再推出一套“转型期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研究丛书”。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和升华。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社会生活内容也随之变化,新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出现、旧的社会生活的消失以及贯穿社会的恒常内容,都成为社会生活研究需要关注和深入研究的方面。正如有学者指出,人类存在并活动于社会生活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社会生活史,因而社会生活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和意义。^① 社会生活史是学术界近年来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并出现了诸多优秀成果。但学界对于社会生活史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还存在分歧,这也意味着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还有相当多的薄弱之处,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研究精力。

1840 年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体现在各个领域,与传统社会迥异,开始了近代社会的转型和文化变迁。“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影响很大,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启动及发展最早、最快,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启动及发展其次,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启动及发展最晚、最慢。整个社会变迁和文化

^① 梁景和:《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河北学刊》2009 年第 3 期。

转型呈现出从东向西、从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一般而言,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乡村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大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中小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①

本丛书共有六本专著,分三大模块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与不同区域诠释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变迁。

一、社会行为与文化

近代中国社会秩序出现了激烈的变动,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在表现形式上及文化塑造上亦随之变化。近代中国,由于内忧外患的加深,整个社会弥漫着愤怒的情绪,面对异常耻辱的外侮,一些爱国者愤而自杀。爱国运动中的自杀行为经过了一些社会建构的环节,被赋予并放大了社会意义。刘长林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极端行为研究——1919-1928 爱国运动中的自杀与社会意义》一书,以 1919-1928 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为例,深入研究自杀社会意义所赋予的问题。

“五四运动”是改变近代中国思想气候的重大事件,《新青年》对“五四时代”时期的社会和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阅读实现的。作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历来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对象。以往对《新青年》的研究,基本从思想史、报刊史、社团史以及文学史四个角度展开,但邓金明的专著《社会生活变迁与青年人阅读生活——以〈新青年〉杂志研究为中心》另辟蹊径,从阅读生活的角度来研究《新青年》。重点研究《新青年》杂志的阅读和传播活动,揭示近现代中国文学生活的深刻变迁。

二、当代文化转型与人文素养

在当代社会变动中,文化也面临着转型问题;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的文化矛盾,

^① 郑大华、胡峰:《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特点》,《光明日报》2010 年 12 月 14 日。

必须认真思考当代中国所处的社会文化转型的根本特点。曾军的《城视时代——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重点讨论视觉文化影响下的文学新变、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以及审美现代性与现时代中国的精神状况。

王天思的《历史的逻辑：主流信仰的理伦培养》一书，对当前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信仰的培养进行了阐述。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新时期，公民作为社会的主体，其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及素养是国民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欧阳光明的《新时期的都市人文素养——一项基于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素养的调查和研究》一书，在抽样调查和系统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全面考察上海市民群体掌握社会科学知识、应用社会科学方法以及弘扬人文精神的现状，分析上海市民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素养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等。

三、社会变迁与城乡文化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城市与乡村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之间人口流动，促进了城乡发生巨大变化。当然城乡发展不平衡，总体而言，城市保持了引领乡村的发展态势。城乡发展不平衡，主要还在于乡村虽然也保持了发展，但其发展速度远远逊于城市。

吴静等编写的《上海卫星城规划》(上、下)一书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卫星城的规划及发展历程。

李缄的《社会变迁、城乡流动与组织转型——〈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文论选〉》，通过对资料的详尽搜集，展示宁波旅沪同乡会是联系宁波和上海以及进一步影响宁波、浙江、上海乃至其他地区的机构。王光东在《社会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社会——新世纪以来城乡流动与文学关系研究》中，重点分析城乡流动在文学上的表现，以及如何影响了文学。中国乡村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重大变化，同时也显现出特别突出的问题。

本丛书没有统一的结论，而是从专题静态研究出发，通过以上不同专题的研究，从历史、文学、哲学等不同学科和视角，重点分析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以期探

求中国民间文化生态在动态时间上的多姿状貌。

各作者希望从各自专题出发,对一些问题、现象或群体进行深入的研究,为当前社会生活研究提供一份详尽的研究样本。当然,由于时间、精力以及学识等各种原因,缺点和问题难免存在,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本丛书得到中央财政项目“城市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的资助,得到第三届文汇·彭心潮优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特致谢意!

丛书编委会

目 录

导论 城视时代的文学与文化	I
---------------------	---

第一章 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文化矛盾	6
----------------------------	---

第一节 面对形成中的支配性文化及其生产方式	6
-----------------------------	---

第二节 “读图时代”批判：视觉文化的兴起及其问题	18
--------------------------------	----

第三节 从“视觉”到“视觉化”：重新理解视觉文化	28
--------------------------------	----

第四节 中国都市文化研究：范式及其问题	38
---------------------------	----

第二章 媒介·技术与观看方式：视觉文化影响下的	
-------------------------	--

文学新变	47
------------	----

第一节 观看上海的方式：以王安忆《长恨歌》为对象	47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视野中的“新媒体文学”	58
------------------------------	----

第三节 大众影评的崛起及其问题	71
-----------------------	----

第四节 “思想者”的文化旅行及其意义	80
--------------------------	----

第五节 视觉文化与观看的政治学	87
-----------------------	----

第三章 区域、地方与现代性：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	
-------------------------	--

冲突	103
----------	-----

第一节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海派”与“韩流”	103
-----------------------------	-----

第二节 地方性的生产与《繁花》的上海叙述	115
----------------------------	-----

第三节	地铁空间：一种深度美学的重塑	133
第四节	市民化进程与城市文化传承	137
第四章	审美现代性与现时代中国的精神状况	149
第一节	方方小说中的“潜对话”现象	149
第二节	改革的辩证法：以熊召政《张居正》为对象	159
第三节	拧巴式幽默：民间社会生活视野下的刘震云 创作	166
第四节	美学的凝滞或凝滞性美学	179
后记		189

导论 城视时代的文学与文化

要想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必须认真思考当代中国所处的社会文化转型的根本特点。在我看来,影响当代文化形成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两个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以照相术为代表的视觉技术内在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构成,不仅创造出全新的艺术样式,而且彻底改变了传统艺术的存在方式;另一个则是作为现代化进程重要表征的城市化、都市化进程,它从外在深刻影响了文学艺术赖以形成和发展的主体、对象、体制和机制,并通过城乡关系的倒转构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巨大压力。因此,我这些年在思考当代文化何以生成、如何演化以及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时候,视觉文化和城市文化成为我切入这一问题思考的重要角度。从视觉文化角度来看,当代文化被称为视觉文化的时代,其实质是特指以现代视觉技术(如照相术、摄像机、放映机、电视台、影院、电脑网络等)为媒介、以运动影像为呈现形态的文化现象。现代工业革命的浪潮所带来的正是视觉媒介及其观看方式——“视角”——的革命。照相机的摄像头成为人类肉眼的延伸,不仅可以替代肉眼从特定的角度进行观看,更重要的是通过相片的形式将人类行为的瞬间固定化,并获得保存,进而改变了人们的记忆方式。从城市文化角度来看,城市化及其问题也成为当代文化想象和创造的重要来源。文化研究从哪里来?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由伯明翰学派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进而与19世纪末以来的人文思潮广泛地联系起来。但是这些人文学术思潮又从哪里来?其实正来自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性构成了文化研究对象的空间属性。

在本书中,将城市文化(其相对晚近的“高速城市化”或“高度城市化”阶段往往被称为“都市文化”)与视觉文化并置在一起,并命名为“城视时代”,意在表明城市化和视觉化不仅仅是构成当代文化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当代文化生产中,城市文化与视觉文化两者之间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甚至作为研究方法



而言,已经密不可分。如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对游荡于巴黎街头的“浪荡者”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①。一方面,城市向你呈现为一种景观的堆积,其视觉经验是城市人确立自己与城市关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城市景观又可以文本化,成为视觉文化捕捉和分析的符号。一方面,全新的视觉媒介技术诞生于城市,并在城市中形成特殊的观看机制,进而弥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城市不断撕裂可视的景观,生产出包含各种权力渗透出来的空间,从而使得城市中的视觉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

本书在结构上按四章展开,第一章重点关注影响当代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并对之展开理论思考。随后几章分别从视觉文化、都市文化和审美文化的角度,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化个案展开深入分析。

第一章讨论了支配性文化的形成、视觉文化和都市文化等相关的几个理论问题。首先,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支配性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其中包含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地位以及精英、大众、民间等多重文化力量的角逐,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支配性的文化生产方式,并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矛盾的重要场域。其次,视觉文化的来临内在地改变了文化的载体、内容、形式以及传播方式,但“读图时代”本身其实只是一个出于传统出版领域中科普类图书的营销策略,因此,它的学术化历程显示出媒介文化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并片面夸大了视觉文化来临对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而在对视觉文化的理解中,我们不能将思维限定在“何为视觉”这一层面上,而应该转向“视觉化”,思考视觉技术对当代文化的弥散性影响。再次,都市化进程正在改变“乡土中国”的格局,都市文化研究也形成了人文主义范式和科学主义范式,分别对当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形成产生不同的作用。

第二章从视觉文化影响下文学新变的角度,重点讨论新的视觉媒介技术所形成的不同的观看方式对文学写作带来的影响。以《长恨歌》为例,王安忆在小说中选择了“鸽子”视点作为审视上海城市变迁的视角,形成既不同于本雅明的“漫游者”,又不同于“外乡人”的与市民文化若即若离的审视距离,试图以同情式理解的方式对上海城市变迁进行全景呈现;新世纪以来,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新媒体文学

^①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朗赫斯特等著:《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页。

的兴起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并形成所谓“三分天下”、“六分天下”之类的文学格局的重新调整。综观文学批评界对“新世纪文学”的讨论、争议及研究,“新世纪文学”对“新媒体文学”的接受还只是“有限包容”,局部接纳。这一有趣的现象折射出“新世纪文学”倡导以来所形成的文学观念。在当代影视文化中,大众影评的兴起成为另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大众不再仅仅满足于成为文化消费者,而且试图成为新的文化生产者。罗丹的雕塑“思想者”凭借有限复制的原则而走向世界,为我们提供了破解文化传统如何成为一种资源的个案。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看,主体的“屈从性”(具体化为“看与被看”的问题)是我们从事视觉文化论域中观看的意识形态研究,展开观看的政治学视界的一把钥匙。观者与表征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一种权力支配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一种文化认同关系。如果说权力支配关系主要体现为观者观看位置的“主动/被动”的话,那么,文化认同关系则意味着观者在进行表征观看中的文化身份的“认同/拒斥”。情境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限制,意味着一种不自由的状态。对于观看情境限制的反抗从来没有中断过。对于自由观看的追求成为观者所努力的目标,对于情境的超越和克服,一直伴随着观者的观看行为。因此,“自由观看”本身就是一种对情境限制进行抵抗的政治。

第三章着重探讨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文化冲突。这里既有全球化陷阱与地方性冲突,也有市民化进程对城市文化传承的双重作用。在 21 世纪初的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海派”和“韩流”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但是它们所指涉的意义及其相关的话语资源却有相当大的差异。“海派”与“韩流”均经过了由文化他者的指认到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并自觉地进行文化主体形象的建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海派”因从一开始就带有的贬义而给自己的主体性重建带来了麻烦,而“韩流”作为一个晚近的产物也很容易令人产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犹疑。作为一种符号政治,“海派”意欲借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风情来恢复文化优越感的历史记忆,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遭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压抑;而“韩流”却借助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撑成为韩国的全民族意识,其充分的市场化运作及在技术层面与世界全方位的接轨也有力地保障了它的巨大成功。在全球化的文化交往中,“海派”的“崇洋”与“排外”使得它与其他地方性文化间的纠葛中损害了自己的文化形象,并阻碍了自身文化影响力的扩展;而“韩流”虽被塑造成在全球化时代、现代化进程中获得独立价值

与尊严的地方性知识,但无论是其民族性还是其现代性的呈现都无法摆脱模仿和抄袭的怀疑,“韩流”与“汉风”间的关系也绝非表面上的温情脉脉与相安无事,也许“韩流”正在陷入文化上的全球化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金字澄的《繁花》是近年来影响巨大的上海文学作品。《繁花》的文学生产刻上了“上海”鲜明的地方性。作家是《上海文学》的资深编辑金字澄,首发之地是上海的“弄堂网”,正式发表是在另一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上海文学期刊《收获》,而专著版则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所有这些“外部因素”均与上海有关,绝非偶然。就小说的“内部因素”来看,小说展开的是从5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将近半个世纪的上海叙述,而其中所涉及的人物,从资本家到商人、从地下党到工人、从知青到律师,涵盖了上海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社会阶层的变迁;自觉接续并扩展从《海上花列传》到张爱玲以来的“上海文学传统”以及“上海话”的方言叙述,同样也强化了这部小说的“上海味”。也许正因为这些从内到外的“上海性”,使得《繁花》成为近两年来最受关注和欢迎的上海文学作品,也使得我们对于《繁花》“上海性”如何形成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内容”层面,而必须将“形式”以及“文学生产机制”等诸多层面的因素纳入进来一起讨论。地铁空间是当代都市一处全新的景观,它因大规模陌生人群的聚集和流动而成为都市象征。同时,因其不断向地下的延伸以及拱廊建筑的全面采用而构成了有别于地面上以摩天大楼为代表的“高度美学”的另一种“深度美学”的重塑。在城市文化传承问题上,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立场,即城市不是文化传承的敌对力量,而是芒福德所说的“文化的容器”,应将之视为一种积极力量。城市文化传承也绝非城市文化的传承问题,而是城市的文化传承问题。在此,“人的活动”因素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对对象性的文化形态和机构性的城市规划的关注遮蔽了对作为城市文化主体的市民因素重要性的认识。城市文化传承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它贯穿于城市化的所有阶段;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市民化进程出现了不同步的现象,形成了不同的市民化问题,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民工”、“先知识化”和“再市民化”等现象也决定了城市文化传承的复杂性。

第四章则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试图重新从总体上把握现时代中国的精神状况。文学和文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时代的精神状况,通过一种虚构想象的方式参与社会意识的建构。方方的小说有意识地在叙述中强调“口是心非”的意义,这类微型对话是否具有类似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的意义?熊召政的《张居正》使我

们有可能借助于一个虚构性的文本来思考关于改革的话题。对于改革家张居正而言,何以“成于改革,毁于改革”?对于由张居正所推动的这场改革运动来说,又何以“成于张居正,毁于张居正”?这里是否包含着千百年来困扰中国改革的死结?《张居正》揭示了张居正改革最终未能完成制度性的设计,使体制有一种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能力,而仅仅依赖于体制内个人的良知与威权,则难免失败的命运。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刘震云的创作与民间社会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一系列小说都以河南新乡延津作为背景,并赋予其民间诙谐文化的鲜明特色。从《我叫刘跃进》开始,这种“刘氏幽默”便有一种更新的名称:“河南式幽默”,而这种幽默与其他幽默不同之处在于“拧巴”。本文从民间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诙谐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刘震云幽默风格的演变及其转型,指出“拧巴”贯穿了刘震云的整个创作史,并在《一句顶一万句》等小说中达到顶峰。到了新世纪,中国的文学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借此把握现时代的精神状况?本文拟用凝滞来描述新世纪以来的文艺状况,主要想同时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意指新世纪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创造性的总体性匮乏,可以用“美学的凝滞”来概括;另一方面,“凝滞”更是对这一段时期美学主导风格的概括,这可能是更为切题的一种思考,姑且可以用“凝滞性美学”来命名。“凝滞”是相对于“进步”、“变化”、“流动”而言的,如果说,后者曾一度是文艺现代性追求的目标的话,那么,“凝滞”则是对新世纪以来出现的艺术现代性(包括后现代性)精神耗散趋向的一种概括。本文想借此表达的是,现代性曾经是多年来文学艺术创造的不懈的冲动,而今可能正在消逝。

第一章 社会文化转型中的 当代中国文化矛盾

第一节 面对形成中的支配性 文化及其生产方式

“理论之后”作为一种理论背景,并非中国文化批评走向困境的标志,而是真正走向“文化自觉”的象征。“理论之后”,西方文化理论并非毫无建树,而是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文化批评实践需要重新确立本土性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应在这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思潮、冲突与激荡中形成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特征的某种认识,更准确地说,应致力于“形成中的支配性文化”的参与性研究,“主流大众文化”可以成为对之的一种命名;在这一以媒介技术、商品消费为取向的文化生产大潮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的便不再只是纯文学、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了,而是由权力、资本、技术以及相应的文化趣味相交织而形成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以及相应的文化产业形态。文化批评需要在文化产业领域进行强有力的批判性质疑和建设性参与,从而真正介入并影响支配性文化的形成。

1. “理论之后”: 中国文化批评的理论背景

伊格尔顿于2003年出版的《理论之后》一书引起了中国文艺学界的强烈震动,中国文艺学界直到现在还是思考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前途与命运的理论背景和重要前提。但是,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其一,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之后”并非“文学理论之后”,而是“文化理论之



后”，他说的是“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其实，类似的声音在 1980 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如米切尔的《反抗理论》、卡维纳的《理论的限度》、保罗·德曼的《对理论的抵制》、玻格斯的《挑战理论》、阿拉克等的《理论的后果》、拉德夫德的《理论状况》、麦奎伦等的《后理论：批评新方向》，等等。早在 1990 年代，詹明信就已在说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最经常被人引用的开头那段话了：“但今天在理论上有所发现的英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其标志是下述的事件：巴特、拉康和雅各布森的死；马尔库塞的去世；阿尔都塞的沉默；尼柯、布朗特日和贝歇的自杀为标志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终结；甚至还有更老一代的学者如萨特的谢世等。”^①因此，“理论之后”首先应该是反思当代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的一个思想背景。其次，伊格尔顿谈论“理论之后”的着重点不在于“文化的危机”、“文学的危机”，而是“理论的危机”，这就显示出了与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很大的区别。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说：“我们被告知，‘理论’已经使文学研究的本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过说这话的人指的不是文学理论，不是系统地解释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分析方法的理论。”^②他们指的更多的是一些最初可能与文学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各种争辩性话题。那么，从理论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来看，其危机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伊格尔顿的观点是：“理论”的普遍性冲动已成强弩之末，“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各种主义已经风光不再。相反，吸引人的是性”。“理论”的批判立场消失，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变得暧昧不清，“学问不再是象牙塔之一种”，“它们回归到日常生活——只是有可能失去批评生活的能力”。由于文化理论完成了将性和大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合法化过程，使“乐趣”（快感）也登堂入室，“微观政治分析”替代了“宏大叙事”主题，革命、阶级、民主和自由等人们曾经赖以寻求认同，确认自我的“集体性观念”变得不再重要^③。再次，文化理论的病症是否也传染到了文学研究，进而带来文学理论的危机？答案既是不言而喻的，但也是需要认真辨析的。如在伊格尔顿看来，“理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即能够对文学、文化等各种现象展开文化政治批评；而对乔纳森·卡勒而言，“理论”则首先是结构主义，即用以

① [美]詹明信：《德国批评传说》，陈清侨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303 页。

②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③ [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1—71 页。

“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与书写有关或无关的社会现象和人类心智结构的钥匙”^①。而这两种理论范式直到现在仍然是文学理论进行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和理论视野。也就是说,尽管“理论”的普遍性冲动看上去正在消散,但它与文学研究的关联并没有同步失效。

其二,“理论之后”算起来应该是从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开始,这是否意味着在“黄金时代”之后西方文化理论不再有所建树,从此销声匿迹?恐怕也不能这样说。仅以作为文化研究之标杆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来说,在继 1960 年代的霍加特时期、1970 年代的斯图尔特·霍尔时期之后,确实到 1980 年代之后呈现出明显式微的景象,但是深受伯明翰学派影响的学人并没有停止文化研究的脚步,斯图尔特·霍尔继续在开放大学身体力行地从事文化研究的教学与研究,其他的学人分布于英国、北美、北欧和澳大利亚,成为散落到世界各地的种子,并发生各种变形与变异:如约翰·费斯克 1980 年代初经受了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的熏陶,1980 年代末到了美国之后更是成为“大众文化迷”,将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倾向推到极致;托尼·本内特也在 1983 年来到澳大利亚,却在 1994 年重返英国开放大学接替斯图尔特·霍尔的教鞭(直到 2009 年再度重返澳大利亚受聘于西悉尼大学),他的选择是致力于将文化政策引入文化研究,试图在批判性知识分子与建设性知识分子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而起步于《解读电视》的约翰·哈特利直到 2000 年都坚守英国本土,2000 年之后受聘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遂成为澳大利亚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对当代文化转型的认识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了重要转变:如果说在 1960、1970 年代他们还多少保留着新左派传统,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视为理解当代文化的转型隐喻的话,那么到了 1980 年代,斯图尔特·霍尔已经发现,时代已经变了,这种思维方式已不再为人们所认可,文化理论必须果断地与这类戏剧式的简单化和二元式的翻转拉开距离,巴赫金的“狂欢”正是替代马克思的“革命”的最合适的“转型的隐喻”。巴赫金的“狂欢”正是对二元区分的逾越,“低文化侵入了高文化,模糊了被强制接受的等级秩序;它所创造的,不是简单地用一种美学战胜另一种美学,而是那种不纯的、混杂的‘怪异’形式;

^① Ja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2007. P23.